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随想录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 贾虹生

国家认同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首先应体现在国家认同上。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国家为实体组成的，现实中没有人生活在国家之外，不管你是身在祖国，还是侨居他乡。我们13亿之众的中国人，99%以上就只能生活在祖先留下的这片国土上。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既是社会统治的机器，也是世界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载体和基本形态。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古代先贤两千多年前概括的这一点，至今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那么，各国人民的福祉必然和他的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利益至上仍是现今世界必然的行事逻辑，爱国主义也就成为各国人民的行为准则，家国情怀自然就被纳入到人们的道德标准和根本利益范围。这一串的关系绝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影响每一个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课题。

笔者曾经两次去过美国，令我颇感震撼的不是那里的先进发达，而是两件小事。一次是代表团参加一个大型活动，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广场，生性自由活泼的美国人，看似无拘无束地嬉笑打闹。但当三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护卫着星条旗正步走入广场时，人们立刻安静下来，右手按在左胸前，表情庄严地注目他们的国旗，偌大广场只听见三名战士的脚步声。可畏的是并没有人提醒，大家都是自觉的。另一次是在饭馆吃饭，当电视里响起“星条旗高高飘扬”的国歌声时，所有正在用餐的美国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表情严肃地按住心口，直到国歌声结束。我当时就想，美国人的爱国情怀，绝不输于任何国家，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美国的强大有着必然关系。

国家认同，离不开对国家基本状况和发展道路的认同。我们的国家，是从一盘散沙、外强瓜分、军阀割据、战火频仍的状况下重新站立起来的。无论说它是“睡着的狮子”，还是说它“东亚的病夫”，都是任人宰割、欺辱的对象。除了掠夺你的资源财富，没人关心你的人民疾苦，国民也变得越来越愚昧和麻木，就像鲁迅先生无情鞭挞的那样。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探索，而今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22美元，发展到2014年人均7595美元，综合国力从贫穷落后一举而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六七亿人民脱离贫困，全体人民不再为温饱发愁，而是向全国小康的标准快速迈进，而且中国人做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抓鳖”……这一切也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不管当下还有多少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已经取得的空前成就都显示着国家、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且它仍然蕴藏着更多的潜力与希望，这就是当今国家的主流。

对于国家、社会存在的问题，领导中国实现复兴事业的中国共产党，给出了以更大决心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解决方案，体现了巨大的气魄和责任担当。但是这条继续改革之旅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注定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配合。如果整个社会不能形成共识，形成强大合力，去攻坚克难，那它的进一步成功，就会变成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

政府代表国家管理着整个社会，也为全体国民的利益工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应简单地将这种关系看作是对立的关系。政府的任务是要在各种利益共同体的利益诉求中，找到并实施某种平衡，在“最大公约数”的涵盖下，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在基本满足各种利益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而这种长远根本利益，也包含着各阶层的利益。

文化认同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还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认同。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从古到今传承下来的文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样定义文化：“人类，只有人类，能够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由于人类具备独特的，彻底变革环境的能力，所以人类不用经过生理上的突变便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具体地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文化，就可以理解它是中华民族为适应与改造生存环境而创造出来的，它就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既然是与生存环境紧密联系，那么，它一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叫作“与时俱进”。但不论怎么变，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离不开我们所说的“大道”。我们的国家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导致国家的衰落和人民受辱，这里确有传统文化保守落后的因素。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瓜分，却也激活了我们文化中固有的自醒、自力、自强，在新的条件下努力寻求适应与变革，以应对新的环境，我们又成功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这一历史变化诚然是学习外部的结果，当然也是自身文化发掘、发挥、融合、变革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当今的改革，事实上也是秉承自己传统文化活的精神，继续创造更好的环境，也同时创造更辉煌文化的必由之路。完全没有必要产生文化自卑、文化自悲的心理，而应有坚定的文化自信。

既然我们从民族文化中可以理解到继续前进的精神依据，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传统文化全是阻碍现代化的负累，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它的精要部分。我们的圣贤主张“内圣外王”，提出“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将“格物、致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其中，重教精学，依道而行，重视修养，就是一个很好的特点，值得抓住并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新秩序，重要的一条是她自身有坚定的信念和铁的纪律，要求其成员都有自觉的党性修养，且始终以人民的福祉为奋斗目标，因而形成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也成为共产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要继续前进，这些民族的、优良的文化就是不可或缺的。

笔者想借此说一个文化现象：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威尔·杜兰特专注于世界文明史研究。这位美国自由勋章获得者曾著书向世界推荐了十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孔子。他在穷50年心血创作的《世界文明史》中，有这样一段话：“群众最常见的做派就是喜欢通过贬抑他人来达到吹嘘自己的目的，尤其是指出伟人的缺点，更可以满足这一心理。”我理解：既然是最常见的做派，那它就是指一种习惯或习俗，既涉及人的认识范畴，又涉及社会传播领域，它也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了。如果把这种现象延伸一下，把“贬抑他人”理解为“他人做的事”，把“伟人的缺点”延伸到“对领导做事的理解”，这样做似乎并没有脱离威尔·杜兰特所指的规律以及范围。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事情不仅仅像中国老百姓所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一种认知和传播习惯，而且在群众的习惯心理中，自然就有一种对管理者、对别人表现的贬抑和距离因素。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社会和民众都应该直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可能对社会进步有间接的积极意义，但更多的可能是对国家文明起消极作用的因素。而它又不是简单命令可以改变的，难怪列宁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

还应该认识到，所谓文化，其实也是意识形态。中国的文化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西方的文化，是形成西方意识形态和所谓价值观的基础。东西方文化不同，其意识形态也就不同，这本没有什么奇怪。而意识形态的不同，会造成社会体制的不同，这也完全合乎逻辑。同时，我们的文化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它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并不影响我们随着社会进步，或为了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而学习外部先进、成功的东西，经过消化吸收，把它本土化。因为外来文化的存在和影响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与外来文化碰撞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在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创造出更好的、更能适应各民族发展的、更新的文化呢？

都说最好的创新是融合，那么，中国参与创造和引领人类新的文化，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正逢其时。

有所思

治国理政的东方智慧

□ 罗宗毅

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国学中蕴含着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东方智慧，是涵养为政之德的文化资源。领导干部学国学，可以从中领悟修身做人之道、为人处事之道、知人用人之道、为官为政之道及治国理政之道，对不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强调“内圣”，重视自身的各种素质素养，完善自己的道德，由内向外、推己及人；另一方面，这种推己及人、由内及外的伦理道德模式又以“外王”为归宿，追求社会事功。

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中、和”三个字，蕴含着管理的极高智慧，可以说是“大道至简”。

“正”是领导权威的基石，“中”是把握好度的智慧，“和”是管理至善的境界。这三者可以视之为管理者的三维坐标。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用一个三维坐标即可对处于物理空间中的物体进行准确定位，并对其运动规律进行描述。同样的，管理问题也可以用“正、中、和”作为三维坐标来加以考量。

第一个字是“正”。“正”是管理要遵循的准则，是对管理者品格的要求，包括“心正、行正、法正、气正”等多方面。它是管理者的立政之本、为官之德，是管理者人格挺立的基石和管理权威的“精、气、神”。古人说：“政者，正也”，“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作为管理者，要让下属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地服从管理，自己必须正心诚意，首善其身，塑造人格，以品格魅力立领导之威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管理。今天我们强调“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律己、严以用权，做人要实、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其核心追求就是一个“正”字。有一句格言：“推动帆船前行的，不是船帆，而是那看不见的风。”领导干部有没有正气在胸，决定了他能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取决于他用权的价值观，取决于他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

第二个字是“中”。“中”是管理要把握的尺度。所谓“中”，即做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到好处。凡事讲度，把握分寸，不走极端。超过一定的“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合乎这个“度”，就是“中”。作为一种管理智慧，“中”要求管理者善于掌握事物之两端，量度而取中。在决策时要多听取矛盾双方的意见，择其善而行。在实践中全面考察事物矛盾的各方面，作出科学判断，统筹兼顾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方面的实际利益，在各方利益的对立统一中求得平衡，实现合作。

第三个字是“和”。“和”是管理者要追求的效果。“和”指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最佳状态，也是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现代管理是一种以和谐为基本要求的管理。“和则多力”，“和聚万方”。管理要获得成功，需要具备许多条件，人际和谐是其关键条件之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的思想讲求和睦、和气、和善，提倡和谐共存、和睦相处、和衷共济。荀子说：“和则一，一则多力。”一个单位和部门，不仅仅是人的集合，还是能量的聚合、思想的磨合、情感的融合。人们和谐相处就能减少内耗，取得一致。取得一致就会力量倍增，组织就会强大。上下齐心协力，就能无往而不胜。善于管理的人，能够把不同的心和力结合在一起，产生“和”的力量。

综合起来看，把管理问题放到“正、中、和”三维坐标中加以考量，有助于管理者多向度、全方位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增强管理工作的预见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事物的发展是个过程，领导干部作决策要全面考察事物发展过程的“始、中、终”，做到“三思而行”。作为管理者，在行动之前，一般要考虑三个问题，借称“三思而行”：一是在管理过程之“始”，要考虑这件事该不该做，能不能做？这是“一思”。二是在管理过程之“中”，要考虑这件事该怎样做，分寸如何把握？这是“再思”。三是在管理过程之“终”，要考虑这件事做了以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群众满意不满意？这是“三思”。“一思”要判断事情是否正当，符不符合“正”的要求；“再思”要判断做法是否恰当，符不符合“中”的要求；“三思”要判断效果是否妥当，符不符合“和”的要求。这是“正、中、和”的理念在管理决策中的应有体现。

管理的要义在“以人为本”，其措施和方式方法要综合考虑“法、理、情”，做到三者兼顾。合情、合理、合法，这一方法论原则体现了“正、中、和”的管理理念，也是管理行为“制度化、合理化、人性化”的现实要求。“正”强调依法依规管理，体现了“制度化”的要求；“中”强调适度管理，体现了“合理化”的要求；“和”强调情感式管理，体现了“人性化”的要求。这是“正、中、和”管理理念在管理方法中的体现，可以说“正、中、和”与“法、理、情”理念共通，异曲同工。

管理要讲“有理、有利、有节”，做到“三个符合”。“有理”，即管理要有理有据，要以理服人，要按章办事；“有利”，即管理中的各项措施办法，要有利于管理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团结和谐，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有节”，即管理要讲节奏，讲节制，讲适度，讲方式方法。只有对管理系统各个方面的相互制约性和管理过程先行后续的连续性作整体性通盘考虑，审时度势，把握好管理的节奏、尺度，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管理效果。这是“正、中、和”管理理念在管理过程控制中的应有体现，“正”则有理，“和”则有利，“中”则有节。

管理的重点在选择干部，用好干部，“正、中、和”的管理理念不但可以体现在管理决策、管理方法和管理过程控制中，还可以体现在对管理者的管理业绩考核过程中。运用“正、中、和”三项标准考核干部的“德、能、绩”。具体来说，是否做到“心正、行正、法正、气正”，是对管理者“德”的考核；是否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做事不偏不倚，把握好“度”，中道行事，是对管理者“能”的考核；是否做到与他人和谐共事，和以安人，以“和”求“合”，带领大家团结干事，是对管理者“绩”的考核。

概而言之，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正、中、和”三字，在现代管理行为和领导行为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努力以正为本、以中为用、以和为贵，真正做到正以立心、中以处事、和以安人，对各类管理行为和领导行为将不无裨益。

教育问题谈

为上海的教育鼓掌

——基础教育调研札记之六

□ 曾业松

我们在国外考察，不时听到外国教育同行赞扬上海，表示要向上海取经。我们在上海见到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翁铁慧同志，一见面就说到这个问题。她说，韩正同志任上海市长时曾经强调：“上海要发展，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所以，多年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始终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作为核心，不断推进改革创新，谋划更高水平的发展。说到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试点，她指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为了给上海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此后三天的考察中，看到听到的一切，让我们深深感悟到了上海教育的境界和改革发展的智慧。

尊重规律改革创新

说起上海教育成就，市教委副主任贾炜告诉我们，去年全市17个区县整体通过国家验收，率先在国内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目标。两次参加OECD组织的PISA测试，分别在数学、阅读、科学素质三大领域，领先于参与测试的65个国家和地区。高水平学生占55.4%，高出OECD平均水平40个百分点。低水平学生仅占3.8%，低于OECD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

上海基础教育所以取得优异成绩，根本上说在于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学规律，不断改革创新。审视上海的教育，正在发生价值取向、质量评价、培养方式、管理模式、教师能力的转型。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把立德树人作为首要任务，实施了《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生命教育指导纲要》。二是加大财政投入，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2014年全市财政性教育经费近800亿元，其中用于区县教育近500亿元，通过中小学建设标准化、规范化，有效地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三是重视老师成长和专业素养，引导老师发挥点石成金的教化功能，不做照本宣科的平庸之辈。四是推进课程改革。“一次课改”建立社会需求、学科体系、学生发展为基点，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的理论模型，构建了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三大板块。“二次课改”推进研究性学习，开发了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课程。全面深化改革试点以来，进一步实施课程、教材、教学、评价一体化。五是推动办学学区化、集团化，全面建设“新优质学校”，让每个学校都赏心悦目，使每个孩子都拥有高层次的文化环境。即便是民办农民工小学，校园环境也要充满阳光，渗透人文关怀和现代教育元素。

守住公平底线

上海基础教育这几年遇到的难题之多、压力之大可谓前所未有。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大量外来人口的积聚，义务教育阶段进入上海就读的随迁子女急剧增加，占全市学生数的比例超过40%。其中，80%以上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和郊区集镇。据几位区县教育局长介绍，奉贤区随迁子女占在校中学生数65%，占小学生数87%；闵行区中小学学生中随迁子女占50%，市中心的黄浦区也占到30%。面对校舍、师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如何接纳潮水般涌来的随迁子女，并确保教育质量不降低，成为棘手的问题。

上海以“合法稳定就业居住”为基本条件，制订实施了《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实施意见》。从2008年开始，启动郊区学校建设工程。“十二五”期间，实施545个基础教育基本建设项目。在此期间，为保证随迁子女入学，先后搭建272所简易学校。随着公办学校吸纳随迁子女的容量扩大，部分民办小学经过设施改造符合基本办学条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2010年简易学校不复存在。目前尚存的158所民办小学，市政府每年生均补贴5500元办学经费。通过购买服务、规范管理，民办学校条件显著改善，教育质量较快提升，逐步得到家长社会的认可。2014—2015学年，53.86万名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免费就读。其中，公办学校就读人数42.17万，占78.3%，在民办小学就读11.69万人，占21.7%。上海千方百计接受数十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入学，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权益，实属难能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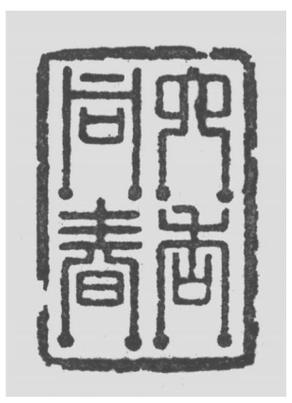
瞄准现代化国际化

上海教育一直追求公平、科学、优质三大目标。为适应信息化、全球化发展趋势，除引进世界一流大学资源，探索中外合作办学机制，加速上海高校国际化进程，还在区县选择若干中学开设国际课程，引入先进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教学管理方式，开拓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面向未来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一流人才。

上海普陀区尚阳外国语学校是九年一贯制学校，也可以说是信息化、现代化、国际化教育的缩影。校长席璐是全国百佳语文教师，多次荣获全国和市级教学、科研奖。老师全是本科学历以上，中高级职称的占65%。学校依托信息化平台，以电子化教材为基础，支持学生在线自主学习，老师在线备课，布置批改作业、解答疑难问题。学校开设多种语言课程，引导学生扎实学好汉语，同时强化英语教学，探索德语、意大利语课程。学校特别重视亲师合作、家校共育，已然成为一个育人共同体。

上海中学位于上海市区，占地345亩，校舍外墙的颜色一律为灰+黄，显示它是一所具有辉煌成就的中学。曾在这里担任20年校长的唐盛昌先生告诉我们，该校学生毕业后70%考入美国前50名的大学。学校课程中外合一，理化课追踪现代科技发展，不断加以更新；历史地理着重分析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地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外教育内容和方式的交流融合，集东西方教育之长，形成混合型教育体系，克服了国内现行教育的弊端，减少了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学校的老师三分之一外请，课堂上中外老师全天候互动。学校有30多个现代科技实验室和国内一流的系列化教学设施，特聘了70多位知名专家作为兼职教授，直接给中学生授课。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上海中学专门设立国际部，在校外籍学生近3000人，来自60多个国家，堪称一所真正一流的国际化学校。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六和同春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